

“茶客” 文库系列

笑里藏着的 经济学

XIAOLI CANGZHE DE
JINGJI XUE

刘福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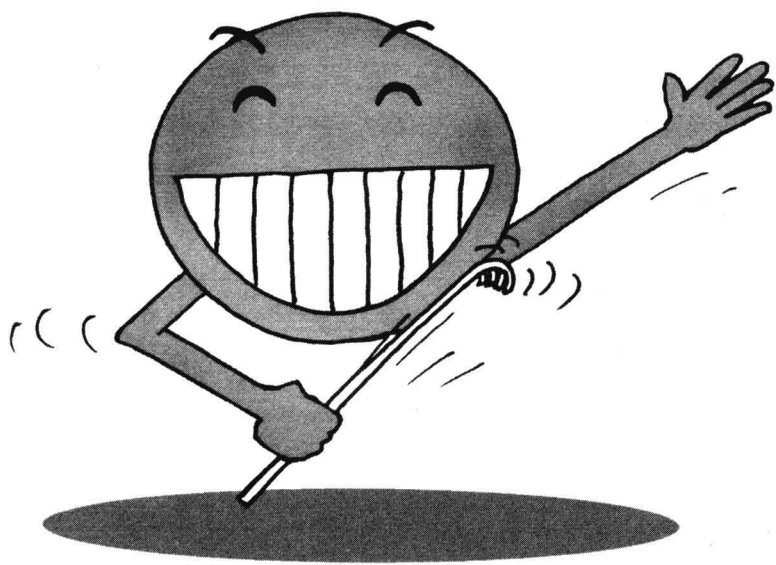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客”文库系列

笑里藏着的 经济学

XIAOLI CANGZHE DE
JINGJI XUE

刘福寿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里藏着的经济学/刘福寿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9-06261-9

I. ① 笑… II. ① 刘… III.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5388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装帧设计: 罗 森

笑里藏着的经济学

刘福寿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239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261-9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888

自序

经济学像一条河，很宽，很长，很深。它从远古流来，流经世界的角角落落。中国有句俗话说：“黄河无底海无边。”经济学这条河的“底”和“边”是没人能测得准的。

我是学过经济学、教过经济学的，但终未有在经济学之河中流击水、勇立滔头的气势和能力，没有享受过“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惬意。一生中只是在经济学之河的河滩上散散步，看看水，至多是在水浅处下了水，蹉跎河，濯濯足而已。

到了暮年，心境更加疏懒。2004年退休前后，明显感到了“心闲”，有了更多的时间，在河之岸，或昼或夜，或站或坐，冷眼观云，静心钓月。但在云停鱼远之时，思绪也会随风飘荡。与经济学缠绵结缘四十年，已达“银婚”，比我和夫人的此境尚早数年。所以，虽然离开了经济学教学，不必再讲“吾道一以贯之”了，但思之所至，总是萦绕着经济与教育飘动。在我思无所得、满心彷徨之际，我的一篇随笔，得到《经济学家茶座》执行主编詹小洪先生的厚爱，于是他把我领进了《茶座》。在门外看，《茶座》不过小肆；进得门来，才知道里面有大风景、大气象。国内外的不少大师常流连于此。最具诱惑力的，是这里的氛围。来的都是“友”，彼此都没了官阶，没了辈分，没了齿序，没了尊卑，没了恩怨，没了名利之心。喜怒哀乐，皆成文章；洗却世俗，返璞归真。这里成了我的“老年大学”。除了认真听课，“打坐诵经”，与“茶友”说天道地外，还得完成“店小二”（詹小洪先生的自谦称呼）留下的“家庭作业”。

又是一个“十年寒窗”。十年来，我完成了几十篇“作业”。我的思想，受着经济学之河潮动波涌、奔流不息的鼓舞，也激起几朵浪花，并打湿了我的“作业”。细品起来，或许还有些味道。例如：

——中国经济学苗弱果瘦，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国”味淡薄，而且患有“贫史症”。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创造了“二元理论”，畅行天下。但我觉得中国经济却是拧了“二元（产业、收入）——一元（市场）——倒二元（社会保障）”的“麻花”。

——恩格尔系数降低了，不少人在吹嘘“富裕”，但他们哪里知道农民正在为此向天而泣。

——劳动力“穷转移”不如“富转移”、“智转移”、“近转移”，民工荒是对“穷转移”的警告。

——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对于资源、环境、生态而言，科技更应该是“第一保护力”。

——在经济学上，中国的孔子确实不如外国的上帝高明。

——大学本应是“社会文明极”，但现在的大学却成了文明的死角，为社会广泛诟病。

——还有那些藏在哭里、笑里、俚语里、被窝里、胃肠里、山寨里的经济学，被地下化了的经济学，村妇生崽的经济学，房屋装修的经济学，红薯换汽车的经济学，等等。

这些东西绝大部分出自《经济学家茶座》，还有一些散见于各类报刊以及博客、QQ日志等，其中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书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社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等转载，有的被一些亲爱的作者所引用。我知道，这些东西登不得大雅之堂。在经济学日益繁盛的今天，在那些鸿篇巨制面前，它们实在只是几棵“星星草”。不过，即使是“星星草”，在它们散乱自在时，算不了什么；但把它们东一棵西一棵地采来，集为一束，再扎上一条红丝带，它们就有了“规模效应”，我也就有胆量把它们送给热心的读者了，虽然心依然有些“丑婆娘不敢见舅姑”的战战兢兢。

我写东西比较看重可读性。我不喜欢用枯燥的语言板着脸孔说话，力争通俗些，活泼些，明快些，幽默些。做不好那是水平问题，但我努力了。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多是些随笔、杂文、散文，只有极少篇目论文倾向较浓，但也尽量使用口语化语言。由于这些东西是多年的积累，已属于历史，除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外，我已无权改动，所以这次成集只好照抄照搬了。因为时代变化

如白驹过隙，在排列顺序上又难免有些“蒙太奇”，怕读者有对“时差”的不适，所以在每篇篇末都加注了写作（或发表）时间。

人老了，笑多了。已近“从心所欲”之年，背上的“包袱”能放的都放下了。此时不笑，更待何时？我从六十多篇文章中抽出《笑里藏着的经济学》作为书名，以表明我对笑的崇拜。

忝为序。

刘福寿

2012年1月26日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 1

[卷一] 学而有问

中国经济学患有“贫史症” / 2

中国经济学亟待中国化 / 7

中国人经济学智慧的哲学表达 / 12

从“张友仁定理”说开去 / 17

如果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 21

简说创新劳动价值论 / 25

“社会组织学”为什么忘了“社会”? / 30

“幸福”三论 / 36

经济学与诗 / 41

俚语经济学 / 48

我与模型化论文的两次邂逅 / 54

[卷二] 时代广角

科学技术也是“第一保护力” / 58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 / 63

回首劳动 / 65

创新：学习型社会的标志 / 67

重奖创新的经济学寓意 / 69

全面理解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内涵 / 71

我们的业余时间属于谁？ / 74

陷阱多多，累煞“理性人” / 78

“包容性增长”断想 / 82

经济学概念被“地下化” / 87

[卷三] 乡间思绪

刮目看农业 / 92

新绿色革命的兴起及其特点 / 96

新绿色改革：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再度选择 / 99

给恩格尔系数淬火 / 106

中国经济不只是“二元”，而是拧了麻花 / 110

热被窝·热炕头·热土地 / 115

遭遇民工荒：别慌！ / 118

“三农问题”与政府责任 / 122

农村劳动力转移需有新思路 / 124

半老农妇，为什么非要生儿子？ / 126

发家“秘密”三思 / 130

[卷四] 说古道外

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工业遗产 / 133

珍贵的一课 / 137

“源头活水”是人才 / 139

上帝比孔子高明 / 141

定州塔·庄子论树·资源观 / 143

当前危机，今古奇观 / 147

关于“红薯换汽车”的联想 / 154

话说旧金山的流浪汉 / 157

拉美病：陷阱乎？伪命题乎？ / 160

伊尔库茨克：人类古朴而又宁静的别墅 / 162

[卷五] 心底流泉

《经济学家茶座》卷首语三则 / 167

我的胃在哪里？ / 170

和谐两题 / 175

笑里藏着的经济学 / 178

跌出神坛的经济学家 / 183

经济学的一个致命误读 / 185

乱弹“和尚”与“念经” / 188

“山寨”招来风满楼 / 192

那年月，我在老舅家度周末 / 198

追梦西沙 / 200

路阴路阳 / 204

[卷六] 校园问善

大学到底应该有多大？ / 208

更新学习理念 提高大学生学习质量 / 214

再读《原毁》，论及学生写作 / 219

应急学：应该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 / 223

关于一般院校经济学类专业教育的几个认识问题 / 226

大学：引领社会文明的旗帜 / 236

大学“文明极”：在应然与实然之间 / 242

今日文人：忍能对面为盗贼 / 247

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读点名著？ / 254

旧话重提议教改 / 257

如何备课？ / 260

民办大学：经济学“失灵”处 / 267

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是民办高校的当务之急 / 272

民办大学当自强 / 279

正在追赶国际一流的台湾高等教育 / 283

后 记 / 288

【卷一】 学而有问 XUE ER YOUWEN

中国经济学患有“贫史症”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中国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作品也越来越丰富。尤其是有了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高标突兀的高层次的研究机构，有了像林毅夫这样一批学贯中西，血气方刚，志在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归派”作中流砥柱，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可是，冷眼相看近几年膨胀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总觉得它像一只充了氢气的气球，美则美矣，只是飘飘乎难以定其身。何也？无根。何以无根？好像是因为患有严重的“贫史症”。

本来，经济学和历史是不能够分家的，甚至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重视历史都是经济学的传统，真正的经济学大师也是钻故纸堆的高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诺思、戴维思、福格尔的新历史经济学，从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分析到索洛的技术进步分析，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到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周期理论，甚至只是一个创新概念的得出、一条倒 U 型曲线的描成，哪一项经济学的成就不是经济学家们在众多国家的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里苦苦寻觅的结果？经济规律总是隐藏在有着漫长时间过程的经济现象背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与经济史学握手。在我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王亚南、许涤新、严中平、巫宝三等都是吃透了中国的“昨天”，才对中国的“今天”取得了那么明确、清晰的认识。昨天、今天、明天不但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就是在人文上也是割不断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外国人在中国史各个领域（如通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国人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失去了兴趣。曾经创造过中国经济史研究繁华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堡垒”，如今的经济史研究也是门可罗雀了。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逝去，他们的学问

已近烟消云散。学经济史并且留下来超凡脱俗地继续坐冷板凳的已寥若晨星(非常惭愧的是,本人也是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不肖弟子)。经济史研究缺乏新意,其著作脱不掉政治史或通史窠臼,不能在现代经济学语境下、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推进经济史研究,对已有的经济思想缺乏总结,对历史规律缺乏探讨,对历史数据缺乏整理。经济学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被割裂,经济学文章缺乏历史分析,“西方经济学模型”+“中国现时材料”已是最时髦的结构。甚至一般院校的经济系开不出像样的经济史课,学经济学的大学

生不懂经济史。

目前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应该说是犯了大忌。历史是割不断的,人们的经济实践活动也是连续的。马克思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甚至可以说,任何革命和“主义”也不是一把可以剪断历史的“剪刀”。今天的经济实践活动,不是在一场革命以后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是昨天经济实践活动的继续。既然如此,经济学作为理论化的经济实践就不能只植根于今天,它更应该植根于昨天。否则,没有历史根基的中国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困境。

现在就有现成的例子。

比如说国企改革。过去人们把国企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可是现在“斯大林模式”早已寿终正寝,西方的“先进”的公司制早已落户中国,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国企依然困难重重?公司制在西方已经经历了500年的打造,可谓炉火纯青,为什么一到中国就失灵了?这就不能不问问历史。历史才是系铃解铃人。其实,说国企和计划经济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本身就是个“冤案”。在中国,虽然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可是“官经济”(即当时的“国有经济”)却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到了近代,我国第一批可以称为“企业”的经济组织都是“国有”的。早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资本国家化”的思想和治国蓝图,它比“斯大林模式”和凯恩斯的宏观管理理论早了20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的核

心部分也是“国有”企业。今天的国有企业虽然与历史上的国有经济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别，但它毕竟是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产力水平、市场的发育状况、生产者和经营者素质、管理（包括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观念等都不可能不受到中国历史的制约。这就是所谓“死人”纠缠“活人”。那种试图让公司制去替换“斯大林模式”并且“一换了之”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所以，解决今天的国企问题不要光给西方模式烧香，还要求一求中国历史这尊“佛”。本人曾接触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管理方面的资料，觉得它们的一些弊端并没有因为“主义”的改换而失传，我们的国有企业今天还犯着和它们类似的错误。所以，研究一下历史上国有经济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的国企改革会有裨益。

再说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三农”问题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拦路虎，其中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备受关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忽视对历史的借鉴。一说到劳动力转移，人们自然想到了两类不同的模式：一类以刘易斯的理论为代表，另一类以托达罗的理论为代表。刘易斯模式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变、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然后通过工业的无限扩张来“吃掉”农业、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完全转移。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工业扩张需要的资本，要走这条路就必然要通过“剪刀差”一类的措施由农业来积累工业资本，这实际上是一条弱化农业、竭泽而渔的工业化路线。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走了这条路，结果吃了亏。60~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批判并逐步放弃这条路线，因此它在实践上的意义已无足轻重。但在此后形成的与刘易斯模式思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托达罗模式却受到了青睐，在中国也很有市场。托达罗模式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对城市而言，预期收入就是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托达罗模式可以写成公式： $d = w \cdot \pi - r$ ，其中 d 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动力， w 代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 π 代表城市的就业概率， r 代表农村的实际收入。如果不考虑城市就业状况，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的内涵简而化之地概括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也就越大。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越穷越转移。如果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这个道理并没有错。但历史告诉我们的

却又不那么简单。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有“穷转移”和“富转移”两种不同的模式。江南在历史上就是我国农业发达地区，农业的收入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那里的商品经济、工场手工业较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较早。富裕的农民带着商品经济观念，带着转移成本和资本，带着生产技术进入城市（城镇），于是城市和城市群也随之而发展起来。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灾荒，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离乡背井，涌入城市。这种转移的农民没有进入城市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没有转移需要的转移成本，更没有资本和技术，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他们依然是滞留在城市的农民。他们很难留在城市。他们又往往与游民、失业、贫困、贫民窟，甚至犯罪、城市暴力联系在一起。所以，“富转移”才是符合发展方向的积极的稳定的人口转移之“流”，而“穷转移”不管其动力有多大，也往往是带有较大负面效应的随风而兴的“波”。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现象，现在还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重演着。这就使人们想到了政策设计是侧重“先转后富”好还是“先富后转”好。现在人们较多地把转移看做是农民增收之策、治穷之策，强调转移为先。我倒觉得，这可能是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如果把思路倒过来，先设法（如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和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强化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等）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起来，然后实现农民的自然转移，或许能更好地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这段话说得长了，是因为有感而发。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写的论文甚至有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专著都不光顾历史，实在令人遗憾。

写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却不研究中国历史，使人想起了索洛的一个批评。他在《经济史与经济学》中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整天埋头制造模型。如此，中国的经济学则更可以省事，连模型都不用制造，现成地拿来就是了。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幼稚和苍白的。不把中国的经济问题看做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的，反而把它看做是在西方人的经济学的模式里孵化出来的，就像美国的一位小学生在作文里说“蛋壳里孵出了个里根总统”一样天真，但没有那么可爱。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为经济史的振臂高呼令人欢

欣鼓舞。被称为“经济学不老人”的吴承明先生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武汉大学的谭崇台先生说，他在哈佛读书时他的老师告诉他：经济系学生的最主要的基础课是经济学、数理统计和经济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德馨先生说，不懂经济史就搞不懂现实，就建设不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但愿这些经济学家们的忠告能春风化雨般地滋润中国经济学。可以预言，只有经济史学在中国兴盛之日，才是中国经济学真正的繁荣之时。(2004/01)



难 飞

中国经济学亟待中国化

拜读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教授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必须国际化》（载于《光明日报》2007年9月4日“理论周刊”）以后，觉得洪先生击中了中国经济学的一个要害。就目前的实际状况看，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水平是太低了，要提升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但是有一点洪先生没有充分注意到，那就是问题不是出在路径选择上。也就是说，走国际化道路，已经被中国经济学普遍接受了，人皆向往之。不但向往，而且走得很急。在经济学的教育中，西方经济学已经独霸天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挤到了“政治两课”中，而有关中国经济学的一些基础课程，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则被挤到了可有可无的角落里。经济学转向如此之快，这是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

那么，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结果为什么不理想呢？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次坐车进京的经历。我们带着一辆已经跑了二十多万公里的“普桑”上了高速公路。大车挡在我们前头，我们超不过；小车从我们身边呼呼流过。我们的车速提不起来，心里干着急。所以，不是路不对，而是车不行。

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虽然它已经转了向，但是它还不具备在高速路上奔跑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教育管理体制，特别是教学模式问题，还没有及时转变过来；另一个方面是历史造成的师资队伍状况、师资的知识结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成为一种巨大的势力。因为我们还没有力量使每个经济学教师都成为“海龟”，绝大多数教师还需要国内培养，而我们的老教师们都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教学方法通过代代相因传承下来，所以在短期内使中国经济学国际化、现代化是不现实的。甚至，其进展速度还受到基础教育的影响，高中生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外语水平等，也